

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述论

邓 晓 何 瑛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前巴文化”即指在巴文化产生之前于环三峡地区出现的区域性文化,它以新石器时期为重心,向上涵盖本地区的整个史前时代。该文化大致成体系传承,其考古发掘与古文献记载大体印证,在经济上由采集狩猎发展而为农耕、畜牧与盐业,产生了最初的权力形态,具有浓厚的以巫为特色的原始宗教色彩,且与继后出现的巴文化关系密切。该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华远古文明基因的探寻。

关键词: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巫文化;巴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5-0085-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510

探源中华文明是学界长时期的热门话题。伴随三峡工程的进行,近二十年来,环三峡地区的史前考古发掘报告和著述文章不时见载,而对三峡地区文献记载的探究成果也时有发表。但将该时期进行整体审视、并系统梳理的著述却并不多见,于是在书写该地区历史时,我们常常习惯于将“巴”视为起点,讲巴及其与周边楚、蜀、秦的故事,而此前漫长时段的重要文化信息却被不经意地淡化。在此提出“前巴”命题,其目的之一是为环三峡地区远古文化落实其载体,其为巴渝文化的重要渊源;二是确认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华远古文明基因的重要价值。

一、“前巴文化”的前研究概述

“前巴文化”是产生于“巴文化”之前,且与“早巴文化”渊源颇深的环三峡地区原生文化。“前巴文化”的内容主要基于对环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献记载,我们对巴文化虽然有较多的探究,但是对“前巴文化”的系统讨论至今尚未进行。巴文化是三代时期环三峡地区的重要区域性文化,近邻楚、蜀、秦乃至夜郎文化均与其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史籍对此不乏记载。《山海经》中,对巴人的起源,甚至追述到早于炎黄的伏羲、神农时代,“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1]38}该说法得到不少古文献的认同。古人对一个西南边远地区的小民族如此“抬爱”,不免令笔者称奇并产生追根溯源的愿望。

对环三峡地区史前文明及巴文化的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初,人们在此发现了系列从远古人类、旧石

收稿日期:2020-03-17

作者简介:邓晓(1956—),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何瑛(1963—),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探究”(16XZJ002)。

器经新石器时代到巴文化的遗址。出于文化内涵相互渗透的缘故,当时学界常将巴与蜀相提并论。最早进行“巴蜀文化”研究的有郭沫若、葛维汉、林名均等人,而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则扩大了对研究的范围,他们的观点主要基于考古发掘。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巴蜀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任乃强、童恩正、董其祥、邓少琴等在田野发掘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古代的巴蜀》《巴蜀史稿》等著述。而根据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苏秉琦、李学勤则提出了“自成一系”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区系”的概念,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古文化。上述研究在追溯巴蜀文化的根源时,均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有关环三峡地区更早的文献与考古学证据。

环三峡地区的再次引人瞩目,是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由于三峡大坝的兴建,我国开始了一轮声势浩大的抢救性发掘,其结果令人震惊。在整个峡区竟然出土了大大小小约 60 个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涵盖了整个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2003 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在巫山龙骨坡发现了“巫山人”下腭骨,时间大约在 204 万年,有学者因此指出这里可能曾是东亚远古人类的故乡。随后,相关的研究著述不断问世,诸如《三峡考古文化》《“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 卷》《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三峡巴文化》《三峡盐业考古》《三峡学》《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下)《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三峡文明史》《长江三峡学概论》《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重庆 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8 卷》《中国三峡文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等等。而这一切对我们关于“前巴文化”的探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如今,环三峡地区集中而丰富的考古学人类遗址发现,已将长江中上游史前文明推到史学研究的前台,它甚至超过了我国许多地区的史前文化堆积标本。然则,我们目前所做的还主要停留在对这里“有什么”,它们“是什么”的解读上,而对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的认知,以及与后来文化之间的关联度探究却甚少。解读“前巴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索其与巴文化的关联,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之于长江文明的重要价值,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二、“前巴文化”的时空范围

1. “前巴文化”的空间描述

“前巴文化”的空间范围,主要位于长江中上游,以三峡地区为核心。这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川鄂山地,在此基础上向周边辐射,大致涉及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和重庆四省一市范围。

三峡地区“地处重庆市东部和湖北省西部,地理坐标大致为 $28^{\circ}09' \sim 32^{\circ}12'N$, $105^{\circ}56' \sim 112^{\circ}05'E$ 。长江由西南向东北,在该区蜿蜒穿过。该地区在地质构造上主要由川东褶皱带和川鄂湘黔隆起带构成,处在长江上游向中游的过渡地带,自然地理位置在由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组成的我国第二阶梯面和第三阶梯面的交界处”^{[2]1-2}。大致以今三峡库区内重庆奉节县为界分为东西两段,形成不同的自然环境(生存空间)。其地貌,东段主要为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古生代碳酸类岩石构成的褶皱山地,包括今奉节、巫山、巫溪、巴东、秭归、兴山至宜昌地面;其西段,海拔约 400~500 米之间,主要由中生带内陆湖相沉积(如砂岩、泥岩和石灰岩)的丘陵地带构成,包括自奉节以上,今云阳、万州、石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至巴南、江津诸区县。

在三峡地区的险峻峡谷地段,两岸群峰环列,悬岩峭壁相对峙,每值夏秋时节,洪水猛涨不宜人居住;但在其它宽谷地段,两岸坡度相对平缓,山前多有不易被洪水淹没的阶地,阶地土层肥沃,成为古人

类活动的理想场所。长江三峡沿线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里有丰富的人类遗址,从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各个时代,人类一直在此繁衍生息。而峡区在整个环三峡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具枢轴作用,峡区东端,连接着富饶广袤的两湖平原,是为鱼米之乡;峡区西端则可以远达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其间,清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等水系发达,交通便利、尽享丰饶物产。

2. “前巴文化”的时间描述

“前巴文化”的时间范畴,当在上述地区自远古人类产生之后,到夏、商时期巴文化出现之前。该时间段历经了旧石器与新石器时期,而文化的重点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为此时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曙光初现。

三峡地区的古人类具有出现时间早、沿江分布的特点。这些遗址从距今 204 万年的巫山猿人到距今约 15 ~ 12 万年的奉节人,时间系列明显且跨度大。有利于对早期人类起源、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现代人的起源等热点问题的研究^[3],其学术价值为古人类学界高度关注。“先巴文化”向上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踪迹,于长江流域人类文明的缘起和继后的巴文化内涵研究具有潜在价值。

“三峡地区很早就被认为是古脊椎动物演化、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开展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最早的地区。”^[24]⁹仅在重庆市范围内就发现有旧石器地点近 100 处,其中最早的发现是 1976 年铜梁文化遗址^[4]。而最大规模的发现是在 1993 ~ 1994 年,由全国考古相关单位为配合“三峡工程”而进行的旧石器专题调查,共发现了 68 个地点^[5]。继后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又在渝西长江、嘉陵江、乌江、西水流域新发现了 10 多个地点,仅 1995 ~ 2005 的十年时间,人们对三峡地区的 28 个重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近 2 万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万余件石制品和大量的动物化石标本。

在三峡地区,有新石器时期遗址约 80 处。从发现成果的时间顺序看: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沿长江两岸开展的文物专题调查成果^[6],其中尤以 1958 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堪称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史前考古发现^[7]。其次是 1992 ~ 1996 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库区发现的 30 处新石器时期遗址^[8],以及 1997 年以来在巫山县人民医院、云阳县大地坪遗址等处的重要发现。再则是 2000 年以来,在西水、乌江、嘉陵江、渝西长江等区域发现的 4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 2014 年在巫溪大水田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最大。该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萌芽的时期,部分资料填补了大溪文化发现的空白^[9]。

对于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2003 年邹后曦、袁东山从整体上提出了由玉溪下层遗址→玉溪上层→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发展关系。“他们将相当于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阶段的重庆峡江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玉溪坪文化’,将 4600 年以后的遗存建议仍以‘哨棚嘴文化’指称。”^[10]¹⁵该命名方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此后针对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晚期遗存基本没有提出过有影响的新命名。

三、“前巴文化”的遗址述略

环三峡地区作为东方人类的摇篮之一有迹可循。在此我们能够找到依时间序列而存在的大量远古人类遗址,它们不仅证明了长江中上游对于华夏远古文明的重要意义,也为当地区域性“巴文化”的形成准备了前提,甚至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楚、蜀文化。

1.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从人类产生的 300 万年到 1 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在时期划分上通常采用“三分法”,即旧石器时

代早期(距今10万年以上)、中期(距今10~2、3万年前)和晚期(距今3~2万年前);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它们的遗存在环三峡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三峡库区的分布最为密集^{[24]13-19}。长期以来,长江三峡就被认为是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Edgar)就在湖北和四川的长江沿岸采集过石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启动,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6月,相关部门对淹没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68个更新世考古和化石地点,其中重要的旧石器遗址近40处。1995年以来,三峡旧石器考古队对三峡地区28个重要遗址开展了十年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

①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在环三峡地区的多处古人类化石遗址中,最著名的有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湖北郧县和奉节兴隆洞。用它们可以大体建构当地从类人猿到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以及现代人起源的模型。

1) 巫山龙骨坡遗址,面积约1300平方米,距今约200万年。1984首先发现,1985年到1988年出土一段带有两颗臼齿的残破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化石、一颗上内侧门齿、两件石器;化石分属的两个个体,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是我国目前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1]。2) 建始人遗址发现于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高坪镇,文化遗物时间在242~180万年前,“与龙骨坡遗址的直线距离为63公里,仅一山之隔”^{[12]69}。1970年7月从西洞中发现两枚古人牙化石和大批巨猿牙化石,通过先后8次发掘,专家们获得了大量古人类生存繁衍资料。3) 郧县人遗址。1989年、1990年在湖北郧县青曲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先后发现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的两具人类头骨化石(郧县直立人),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4) 兴隆洞遗址位于奉节县云雾乡,于2001年至2002年发掘,出土4枚人类牙齿化石、20件石制品,距今约15~12万年。专家认为遗物中的石哨、石鸮和剑齿象牙刻痕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对原始艺术的起源、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意义重大^[13]。5) 烟墩堡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城,发现于1994年3月。该遗址为石器制作场所,出土石制品1341件,保留了大量古人生产活动的原始信息。“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受到了当地政府和考古学界的关注,曾入选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4]206}6) 孙家洞遗址位于湖北秭归县城西南约50公里的两河口镇二甲村,该遗址的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初步调查表明该遗址石制品和伴生动物化石丰富,地层未被扰动,具有良好的科学考察前景^[14]。

②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遗址。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群,集中分布于重庆丰都长江两岸的二、三级基座阶地。其代表有高家镇遗址、冉家路口遗址、井水湾遗址和枣子坪遗址等。

1) 高家镇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桂花二村,1994年发现,出土石制品约2500件。该遗址是一处石料采集场和就地加工石器的作坊,遗址以大型砍砸器为主,运用锤击法剥片和简单加工,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的鲜明特点^[15]。2) 冉家路口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镇江镇建设村,2000~2007年抢救性发掘,作为石料采集场和粗加工基地出土石制品1636件,是发掘次数最多、揭露面积最大、历时最长的一处重点遗址^{[24]60}。出土石器呈现较强的石片工业特点,即成批制作、形状类似^[16]。3) 井水湾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新湾村,该遗址在1998~2002年间进行了5次系统发掘,共出土石制品910件、烧石6件、动物化石58件,是一处石料采集场和粗加工基地,除了采石、加工石核、剥片、简单修复外,还保留了一些古人类在河流沿岸生存的信息。遗址距今约8万年。

4) 枣子坪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新湾村,2000~2002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出土了101件石制品。专家认为该处石器具有长宽等比小型化的特点,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有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17]。

从上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我们看到了环三峡地区古人类的起源及分布状况,大规模的石器加工场与大量动植物化石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场景,而该时期出现的石哨、石鸮和

剑齿象牙上的刻痕,则表明当地原始先民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思维已经萌芽。

2. 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重要遗址

该段时间在距今1~3万年,其文化特点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过渡。主要遗址有奉节鱼腹浦、奉节洋安渡、奉节三沱、奉节横路、万州渣子门、忠县唐家河、丰都和平村、丰都老鹰嘴以及巫山的上、中、下安坪,嘉陵江流域的铜梁的张二塘、合川的唐家坝等。

1) 铜梁张二塘遗址于1978年发现,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出土一段距今 24450 ± 850 年的人类肱骨化石和300余件旧石器及动、植物化石。该发现有利于认知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传统和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二元结构^[18]。类似文化遗存在嘉陵江、涪江、沱江流域亦有发现^[19]。2) 鱼腹浦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1994年试掘,1998年抢救性发掘,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12个规律排列、有用火痕迹的火塘遗迹和386件石制品、2件陶片和许多中小型动物骨骼化石^[20],为古人类住所。陶片与火塘的出现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早期遗存和原始宗教的研究价值重大。3) 奉节洋安渡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洋安渡村,出土石制品619件、磨制骨锥3件、陶片320余件和动物骨骼301件。当地人以渔猎经济为主,出现了磨制工具和陶器,但打制石器仍继续使用,专家认为此举符合过渡时期人类社会生产省时、省力的经济原则^[21]。4) 奉节横路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康乐镇横路村北侧梅溪河岸,1998~2000年两次发掘,出土105件石制品。古人因当地无鹅卵石可取,无法用常见的“摔碰技术”制作石器,便从周边开采石料至此并用锤击法剥片加工成为简单的刮削器,制品以中小型、窄薄型石器为主^[22]。5) 奉节三沱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安坪乡三沱村,2000年、2002年两次发掘,上层具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特点,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石制品24件,动物骨骼20件分属豪猪、鹿类、羊、猪类标本。该遗址应该是一处古人从事生产和生活的综合性场所^[23]。6) 丰都和平村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镇江镇和平村,2001年系统发掘,出土石制品89件,其中的4件石斧中3件仅刃部磨光,被视为文化内涵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体现。7) 奉节藕塘遗址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安坪乡藕塘村北,分布在长江南岸的几个台地上。1993年发现,2006年钻探发掘,是一处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夹砂陶器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该遗址主要发现有陶片和石制品147件,未发现灰坑、墓葬等遗迹^{[32]38-39}。

上述遗址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工具由打制向磨制发展、器型由大变小、陶器出现、饲养中小型动物、人类活动范围拓宽、原始宗教初现等。在其中部分遗址中两种文化的重叠,证明了当地人类文化的延续,它们是探索环三峡地区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连续性的重要线索。

3.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主要遗址

①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主要遗址

1) 玉溪遗址(下层)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村,1992年发现,1999年正式发掘。遗址下层距今约7600年^[24],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积淀有厚达3.5米的骨渣与生活垃圾遗存,反映出当时居民以渔猎、捕捞为主的经济生活。2) 城背溪遗址位于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吴家岗村,年代在公元前6500至公元前5000年间,1973~1984年间数次发掘,出土文物1万多件,其中:石器以打制为主,通体磨制的较少,陶器以满饰绳纹的猪嘴状支座最具特色^[25]。除水稻种植外,“渔猎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也同时占有重要地位”^[26]。3) 柳林溪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经1981~2000年多次发掘出土石器制品2000余件,陶器1000余件。石器中的黑燧石透雕人像与原始巫术相关,另有一件被疑为“神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人像,在空心三角形和实心三角形图案间刻有飞禽,可能是寓意人立于天地之间^[27]。

②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遗址

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被广泛发现,有丰都玉溪遗址,涪陵陈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遗址群,忠县谿井沟遗址群,万州苏和坪、黄柏溪、涪溪口遗址,云阳丝栗包、大地坪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巫山大溪、锁龙、魏家梁子遗址等近 20 个。

1) 玉溪遗址(上层)遗存堆积约厚 2 米,出土有打制、磨制石器,多台面小燧石石核和少量陶片。其“陶器多泥质陶,以灰陶和褐陶为主”^{[32]72},主要标本有折沿釜(罐)、卷沿盆、深腹缸、敛口钵、附耳钵、敞口钵、纺轮等。时间在 6200 年左右。2) 哨棚嘴遗址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红星村,于 1994~2000 年发掘积淀厚 6~7 米,其中“一期文化”属新石器时代遗存,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卷沿罐器物群盛行;距今约 5500~5100 年,与玉溪(上层)文化相承。有学者推测该文化“与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联系”^[28]。3) 玉溪坪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龙孔乡玉溪坪村,其文化经玉溪上层发展而来,经 2001、2002 年两次发掘,堆积厚 4 米,遗物包括从“玉溪坪文化”到“中坝文化”两个阶段的遗存,以夹砂折沿罐为特征(末期向盘口演变)。该文化覆盖面广,是重庆峡江新石器晚期鼎盛时期的文化^[29]。4) 中坝遗址位于忠县县城正北 6 公里谿井河两岸的台地,距今 4600~3700 年;1990~1999 年抢救性发掘,文化堆积层 12.5 米,其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大量陶、石、骨类文物,“是在继承本地玉溪坪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融合而成的自具地方特色的一支考古学文化。”^[30]5) 大河口遗址位于涪陵区义和镇朱砂村六组长江边,距今 5300 至 4600 年,2018 年出土新石器时期遗物有陶片、石器、骨器、动物骨骼等,其中石制品合计 177 件,是三峡以西地区发现为数不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对完善三峡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有重要参考价值^{[31]289}。

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具有数量多、分布广、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除磨制石器普遍出现外,不同区域的陶器也具有了不同特征,其中的一些遗址还奠定了后世历代人类聚落的基础,体现出明显的文化传承性,具有强烈宗教内涵的雕刻品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四、“前巴文化”中的大溪文化

单独介绍新石器时期大溪文化的主要原因是它自成体系。

在长江中上游文化中,以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最为著名且关联紧密。首先,距今 6000 年以上的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西陵峡及峡口以东宜都一带,其重要遗址有秭归柳林溪、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等,它可能较大地影响了大溪文化。杨权喜认为城背溪文化分布于大溪文化的中心区域内,“从这两种文化的遗物,特别是出土的陶器来看,它们之间有许多内在联系”^[32]。其次,距今 5000~4600 年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的屈家岭文化,其分布范围主要在江汉平原,其西可达巫峡,南达湖南澧县,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来的”^{[33]37,39}。第三,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距今 4800~4200 年石家河文化,亦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其在峡江的代表性遗存是宜昌白庙和秭归庙坪,该文化因发现有青铜块、玉器、祭祀遗迹和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与城址,被认为可能进入了文明时代。

大溪文化因瞿塘峡东口,今重庆市巫山县的大溪遗址而得名,但它并非大溪文化的中心。“目前已知的大溪文化分布范围,西起渝东南,东到鄂东南,南达洞庭湖北岸,北抵京山和大洪山南麓,横跨湘、鄂、渝二省一市。”^{[34]32,33}重要遗址有:巫山大溪、巫山大水田、巫山人民医院、秭归龚家大沟、秭归朝天嘴、宜昌中堡岛、宜昌杨家湾、宜昌清水滩、宜昌五相庙、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澧县城头山、澧县三元宫、澧县丁家岗、安乡划城岗、安乡汤家岗、华容车轱山、江陵朱家台、江陵毛家山、钟祥六合、钟祥边畈、京山朱家嘴、京山屈家岭、京山油子岭、天门谭家岭、酉阳笔山坝等 28 处。

大溪文化的时间距今 6500 ~ 5300 年,分为早期(6500 ~ 6000)、中期(6000 ~ 5600)和晚期(5600 ~ 5300)。多数学者认为大溪文化的形成与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关,而屈家岭文化承其后。其间,仰韶文化对它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巫山欧家老屋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顶碗、带状黑彩钵等陶器一脉相承”^[35]。对该文化的重点遗址按地域简述如下。

1. 大溪文化在西陵峡以西地区的主要遗址

1) 大溪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城西 45 公里处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从 1959 年到 1994 年,进行了多次发掘,共发掘墓葬 200 余座。大溪遗址的陶器主要为彩陶,陶器中“圜足器三足较普遍”^[55]^{37,38},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以仰身直肢葬与屈肢葬(含跪屈式和蹲屈式)为主,墓中多有随葬品(以随葬鱼为特色)。2) 大水田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伍柏村,西距大溪遗址 28 公里。2014 年 3 至 9 月,发掘墓葬 212 座,房址 1 座,灰坑 208 座,其中陶面具形器、石质动物、人面、环形饰、生育崇拜石质人像的发现,提供了大溪文化认知领域考古的新材料,有助于了解大溪文化,原始宗教、社会组织、精神意识等深层次问题^[36]。3) 笔山坝遗址位于重庆酉阳笔山坝。2007 年在该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年代距今约 7000 ~ 5500 年,其晚期出现了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两组器物。该发现被认为,对于大溪文化在重庆地区的分布和传播线路研究,及对大溪文化的总体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7]。

2. 大溪文化在西陵峡以东地区的主要遗址

1) 中堡岛遗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县城西约 25 公里处,地处长江西陵峡东口靠南岸的河滩—中部隆起的小岛中部。1979 年首次发掘,发现大溪文化遗存及屈家岭文化遗存,其文化“属于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过渡类遗存”^[38]。1985 年至 1986 年,再次大规模发掘,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器、石器与骨器。2) 关庙山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县城东北 11.5 公里的江汉平原西部边缘,1975 年发现并试掘,1978 ~ 1980 年两次发掘。除房址、瓮棺葬、石器、骨器外,陶片和红烧土中“稻谷壳碎屑和碳化稻谷”的发现表明其稻作农业经济的实质^[39]。3) 城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县城西北东溪乡南岳村,1991 ~ 1998 年先后 8 次发掘。遗存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大溪文化发现圆形城址一座,外有壕沟、内有祭坛、房址、制陶作坊、屈肢墓葬、水稻田遗址等,被认为“早于我国史前任何文化遗址率先进入父系氏族公社”^[40]。4) 汤家岗遗址位于湖南省安乡县城北,1978 年发掘,出土遗物中以精细的印文白陶引人注目。汤家岗遗址出现了原始农业,当地栽培的水稻属于似籼型品种^[41]。专家指出,“该遗址为研究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的年代和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56]³⁷。5) 三元宫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县城北 16 公里处,于 1966 年发现,1967 年试掘,1974 年底正式发掘,发现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在该遗址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块红烧土建筑遗迹,并清理墓葬 23 座。专家指出,“屈家岭文化三元宫类型的前身及其后继者,大体是本地区的大溪文化及龙山期文化遗存”^[42]。

由上可见,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特点鲜明:它传承有序,上承城背溪文化下启屈家岭文化;它覆盖湘、鄂、渝,在西陵峡东西两侧均有代表性遗址;它因时因地在西陵峡东西分别形成以农耕和以渔猎为主的生业形态;彩陶、雕刻与墓葬形式特色突出,原始宗教业已产生。大溪文化与瞿塘峡以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环三峡地区该期“前巴文化”的整体面貌。

五、四点认识

环三峡地区的“前巴文化”无疑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对它的考古学调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四点认知。

认识之一,环三峡地区是中华远古人类的摇篮。对在此有限空间近 30 个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古人类学家曾阐述了七大文化特点及学术意义^{[43]2}。试概括如下:其一,龙骨坡巫山人的发现,改变了之前中国古人类限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的认识,其于早更新世便在三峡地区生存和繁衍;其二,三峡地区古人类文化遗址沿长江2、3级阶地分布表明,当时的人类沿江生活,且能够利用长江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其三,三峡古人类用砸击法将砾石(河卵石)劈裂,制作石器,这种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的行为,反映出其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对组合技术的娴熟使用;其四,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南方砾石工业”的工具制作手段与初级磨制石器、原始陶片的共生,即体现了当地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及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的过渡。笔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三峡地区,垂直、多变的地貌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其先民得以避免不停迁徙的资源消耗性生产方式,此亦即当地大量遗址得以集中出现的原因。为此,三峡地区堪称东方人类摇篮。

认识之二,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发达。从文化渊源看,主要为在地原发,规模从小到大:其一,当地大量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遗址表明,其文化的传承是以原生为主的;其二,仅以重庆地区为例,新石器时代遗址便达到33处(2010年)^{[32]12},说明人类此时的活动更加频繁,范围也更大。从文化线索看,依据“四分法”(早、中、晚、末期)可形成两大谱系,且相互影响:在三峡东段(瞿塘峡至西陵峡以及附近地区),代表性文化序列大抵为:桅杆坪遗址(长江支流清江流域)、城背溪遗址→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在三峡西段(重庆以下到奉节地区)代表性文化序列大抵为:奉节横路遗址、奉节鱼腹浦遗址→玉溪下层文化→玉溪上层文化、哨棚嘴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对两个文化序列间的关系,白九江认为:“其中,在新石器文化中期以前,三峡东、西段的考古文化虽然有明显差异,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可以定性为有亲缘关系的文化交互作用圈,从新石器晚期阶段起,三峡东、西部文化差异明显,分属两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但两者间有着较明显的文化交流,到了晚期阶段,中坝文化对白庙遗存的影响甚深。”^[35]由上,笔者认为渊源深厚、数量众多、序列清晰、交流频繁,此为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达的标志。

认识之三,原始宗教现象产生早且表现突出。宗教观念的早现无疑是人类思维进步的标志,环三峡地区人类产生早、石器时代遗址丰富、文化序列清晰是当地宗教观念早熟的前提。首先,是旧石器时代奉节兴隆洞遗址出土的石哨、石鸮和剑齿象牙刻痕;其次,是奉节鱼腹浦遗址有规律排列的火塘与焚烧的遗物;继后,是新石器时代湖北秭归柳林溪出土的人物座像、东门头发现的“太阳人”像^[44];第三,有巫山大溪、大水田复杂的丧葬方式、随葬品和人像雕刻、丰富的彩陶纹饰等等。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在环三峡地区,巫术形式的原始宗教不但早熟而且兴盛。而上述考古发现中的巫术盛行现象又刚好与古籍记载所述相印证,“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1]365}又“《归藏》曰: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45]25}。笔者认为,这种“不谋而合”正好表明,在环三峡地区的前巴文化时期,人类的原始宗教(巫文化)早产并盛行。

认识之四,“前巴文化”的继承与走向。首先“巴文化”继承了“前巴文化”,一是从夏商时期考古材料看,早期巴文化圈所在地,恰是大溪文化覆盖的西陵峡、鄂西、黔东北、渝东南及西陵峡以东地区,有学者指出,“鄂西、三峡地区是早期巴人起源地”^[46]。二是就文献研究看,任乃强指出大溪人曾以盐腌鱼,在其墓中“发现皆有大量鱼骨”^{[47]305,306},其住地不远处亦产盐。《山海经》也提到三峡地区“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1]355}。他们靠鱼盐交换获取生存资料。据董其祥考证,《世本》所谓巴人廩君蛮“故出巫蜚(诞)”的巫蜚就是《山海经》中的“巫载”,“大巴山、巫山地方,正是古巴族巫蜚活动、聚居之所”^{[48]19}。考古发掘和文献考证均表明,巴族的渊源就在环三峡地区。其次,对巴文化的来龙去脉,杨华等人的观点^[49]似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其一,西陵峡及该峡以东地区、黔东北、渝东南地区,可统归为“早期巴文化遗存”分布区。其二,在巫峡的东、西侧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出土遗物有一

定差异,但“两地相同的器类应占主导地位”。其三,三峡北面大巴山、米仓山以南的嘉陵江及渠江流域,可归为“早期巴文化遗存”的范畴。巴人一支曾“于商代早期晚些时候”北迁进入汉水流域^[50]。其四,成都“早期蜀文化遗存”中,较多遗物器形与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遗存”惊人地相似且时间略晚,显然后者“对成都地区蜀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强烈的”。其五,李学勤认为蜀文化里的中原商文化因素系经两湖入川,其间“则势必沿江穿过三峡”,三峡地区有大量居住遗址和类似器物实证。其六,《竹书纪年》《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史籍和殷墟甲骨文中,有夏商王朝与巴人交流及征战的记录,而三峡考古发现的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则“肯定了文献中记载的真实性”。由上,笔者得出三点认识:一是巴文化为环三峡地区的原生文化,是“前巴文化”的延续;但受“前巴文化”复杂性影响而具有“泛巴”性质,此亦巴人起源及传说无法统一的重要原因。二是早巴文化凭借发达的水系由三峡向北、向西扩展,类似遗物在上述地区的出现应视为本末关系而不是相反。三是中原夏、商政权对三峡地区的高度关注,缘于三峡走廊的地位(枢轴作用)、丰富的盐资源和土著文化扩张的潜在威胁;而大量带有夏、商文化特色的器物在环三峡地区及川西平原出现,当为夏商文化影响的结果。

六、结 语

我们习惯于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为“文明史”,事实上相对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它仅仅只是一瞬间,但“文明”阶段本身大量文献的保留,导致了整个历史研究重心的后移。而“文明”对史前时代的记忆,又往往因为时间久远而语焉不详,甚至神话杂糅。幸而有百年来科学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的践行,使扑朔迷离的远古传说逐渐变得清晰,也使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得见天日。

综上所述,我们强调以下观点:第一,环三峡地区的史前文化源远流长,因其产生于当地主流文化“巴文化”之前,我们将其称为“前巴文化”;第二,环三峡地区是我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贯穿整个石器时代丰富的遗址群,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三,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到新石器时代,发育成以瞿塘峡为界,东、西两侧不同的谱系,其间交流频繁,内涵大同小异,共同构成早巴文化的基础;第四,环三峡地区的特殊地貌对当地人类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了峡区以渔猎为主(晚期增加盐业)、宽谷以种植为主的生业;第五,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浓厚的巫文化氛围在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表现突出,且对周边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据此,我们确认史前长江中上游环三峡地区曾经有过较为发达的“前巴文化”,它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来“巴渝文化”的主要渊源。

[参 考 文 献]

- [1] 李润英,陈焕良注译. 山海经[M]. 长沙:岳麓书社,2006.
- [2] 高星,裴树文. 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M]. 成都:巴蜀书社 2010.
- [3] 武仙竹,裴树文等. 中国三峡地区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J]. 考古,2009(3).
- [4] 李宣民,张森水. 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4).
- [5] 李毅,陈琄. 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报告[C]//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 [6] 四川省博物馆. 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1959(8).
- [7] 四川省博物馆. 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J]. 考古学报,1981(4).
- [8]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 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

社,2010.

- [9]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重庆考古 60 年[J]. 四川文物,2009 (6).
- [10] 白九江. 重庆地区新石器文化[M]. 成都:巴蜀书社,2010.
- [11] 黄万波等. 亚洲的早期人类化石及其石器制品[J]. 自然,1995(第 378 卷).
- [12] 魏光飏. 峡江寻梦[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13] 黄万波,徐自强等. 14 万年前奉节人——天坑地缝地区发现古人类遗址[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4] 董明星. 湖北秭归孙家洞旧石器文化遗址调查简报[J]. 人类学学报,1999(2).
- [15] 裴树文,卫奇等. 高家镇旧石器遗址 1998 年出土的石制品[J]. 人类学学报, 2005(2).
- [16] 陈福友,高星等. 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的初步研究[J]. 人类学学报,2004(4). 高星,卫奇等. 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 2005 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 2008(1).
- [17] 裴树文,陈福友等. 三峡地区枣子坪旧石器遗址[J]. 人类学学报,2004(3).
- [18] 李宣民,张森水. 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4).
- [19] 李宣民. 桃花溪旧石器[J]. 人类学报,1992 (2).
- [2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等. 奉节鱼腹浦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 [21] 陈福友,冯兴无,高星,姚炯,吴永健. 三峡洋安渡遗址石制品研究[J]. 人类学学报,2006(4).
- [22] 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 奉节横路遗址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 [2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 奉节三沱遗址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上)).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 [24] 邹后曦,袁东山. 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C].//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 [25] 林春,黎泽高. 城背溪遗址复查记[J]. 江汉考古,1988(4).
- [26] 杨权喜. 试论城背溪文化[J]. 东南文化,1991(5).
- [27] 王凤竹,黄文新,罗运兵. 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 1998 年发掘简报[J]. 考古,2000(8).
- [28] 江章华. 关于哨棚嘴文化的几个问题[J]. 四川文物,2010(1).
- [29] 王海阔,徐静,白九江,袁东山. 重庆市丰都县玉溪坪遗址 2002 年度发掘简报[J]. 南方民族考古,2015(11).
- [30] 于孟洲. 重庆峡江地区中坝文化研究. 考古与文物,2010(3).
- [3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涪陵区博物馆. 重庆涪陵长江两岸考古调查与勘探[M]//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 [32] 杨权喜. 试论城背溪文化[J]. 东南文化,1991(5).
- [33] 管维良,李禹阶主编. 三峡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 [34]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 大溪[M]. 北京:中国图书出版社,2017.
- [35] 白九江. 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廊道效应、互惠交换、在地精神和简单聚落[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
- [3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重庆市巫山县大水田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发掘简报[J]. 考古,2017(1).
- [37]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 “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C]//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 [38] 白九江. 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屈家岭和哨棚嘴三种文化因素的分析[J]. 江汉考古,2003(2).
- [39] 阎孝玉. 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浅析[J]. 中国农史,1996(3).
- [40] 曹卫平. 再论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住民所处之社会形态[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 [41] 张文绪 裴安平. 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中稻谷稃面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J]. 作物学报,1998(3).
- [42] 朱乃诚. 三元宫墓葬的分期及其文化性质[J]. 考古,1990(5).

- [43] 高星,裴树文,冯兴无,陈福友,卫奇. 三峡地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地位[C]//重庆文物局,重庆移民局编. 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44] 邓晓,何瑛. 美术考古视野下的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石质人像雕像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 [45] [宋] 李昉等. 太平御览(第4册)[M]. 上海:上海书店,1939.
- [46] 杨华. 从鄂西地区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J]. 考古与文物,1995(1).
- [47] 任乃强著,任新建编:川大史学·任乃强卷[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48] 重庆三峡博物馆编. 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49] 杨华. 三峡考古发现对早期巴文化的新认识[J]. 长江文明,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4).
- [50]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 城固宝山·1998 年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On “Qianba Culture” arou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Deng Xiao He Y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Qianba culture” refers to the regional culture that appeared around the Three Gorges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Ba culture. It focuses on the Neolithic period and covers the whole prehistoric period of the region. This culture is generally inherited in a systematic way, which is generally confirmed by it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ancient literature records. In terms of economy, it developed from gathering and hunting to farming, animal husbandry and salt industry, resulting in the initial form of power, with a strong primitive religious color characterized by witchcraft,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bsequent Ba culture. The study of this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gene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words: the Three Gorges area; Qianba culture; witchery culture; Ba culture

[责任编辑:刘力]